



戰略與
國際關係

● 作者/Graham Allison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馬浩翔

重新界定的影響力範圍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Sharing the Globe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取材/2020年3-4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圖為美太平洋司令拉克里爾上將與中共副總參謀長戚建國中將會晤。(Source: US Pacific Command/Carl Hudson)

美國贏得冷戰後所創造的單極世界，正隨其與對手間實力消長而改變，華府決策當局應審慎思考如何因應勢力範圍再度形成之局面。





在冷戰剛結束時歡欣鼓舞氛圍中，美國決策高層宣布地緣政治中的一項基本概念已然過時。時任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描述，「新世界強權已不再以影響力範圍……或強加其意志於弱國等方式界定。」隨後擔任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宣布，「美國不承認有影響力範圍存在。」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則主張，「門羅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這如同結束美國近兩世紀來對於自身在西半球影響力範圍的強硬堅持。

這些宣示若以地緣政治情勢已然改變的情況來看確實如此。但以實際條件而言卻是大錯特錯。美國決策高層不再承認其勢力範圍存在——亦即不承認其他強權有能力要求他國不得插手其區域事務，或在該區域行使絕對支配權——並非此概念已經過時。相反地，這是因為實際上全世界都已經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原本各自存在的範圍合而為一，強權依然會對弱國強加其意志；世界上其他國家大致也被迫遵守美國的遊戲規則，否則就得付出慘痛代價，從癱瘓性制裁乃至直接推翻政權。原本那些影響力範圍並未消失；它們只是在美國霸權的壓倒性宰制下，融合為一體。

如今，美國霸權正逐漸式微，華府當局亦已認清未來將是所謂「強權競爭新時代」，中共與俄羅斯會不斷擴大並運用其實力，爭取與美國立場多有衝突的利益和價值。但美國決策高層和分析家仍然努力試圖瞭解，在未來如此新時代世界中美國將扮演何種角色。展望未來，此角色不僅會與今日大不相同；美國的地位也必然大幅下滑。

雖然領導高層仍會繼續提出雄圖大業，但削弱的手段只會帶來差強人意的結果。

單極世界已然結束，其他國家會照單全收由美國主導之國際秩序所賦予地位，而如此幻想也將告終。對美國而言，未來所須接受的事實是，今日世界會有多個勢力範圍，並非均壟罩在美國的羽翼之下。

一如往昔的世界

在宣布新地緣政治遊戲規則前，後冷戰時代的歷任美國國務卿原本應先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那幾個月的歷史，當年美國決策高層也同樣拒絕接受一個具有多個勢力範圍的事實，而仍舊以地緣政治作為核心特徵的世界。當年在此議題上針鋒相對的觀點，曾是兩位美國政府首席蘇聯專家的辯論核心。

1945年2月4日，小羅斯福總統和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及英國首相邱吉爾在雅爾達會面。在小羅斯福身旁是其蘇聯事務首席顧問兼翻譯波倫(Charles Bohlen)。在當天早上，波倫打開了其親近同僚肯楠(George Kennan)從莫斯科寄來的緊急私人函件。肯楠正確預判蘇聯定會設法控制其勢力所及的歐洲地區，問題是美國應如何加以因應。肯楠質問，「何以我們不能就此點做出合適且明確的妥協，也就是將歐洲公開劃分為兩個勢力範圍，美國退出蘇俄的勢力範圍，同時也讓對方同樣待之呢？」

波倫十分驚恐，他立即回覆，「絕對不可能，民主國家不能做出如此外交政策。」波倫後來回憶當時情況，他解釋：「美國人民在打了一場漫長艱



1945年2月4日，小羅斯福總統和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及英國首相邱吉爾在雅爾達會面。(Source: U.S. National Archives)

困戰爭後，至少值得嘗試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從1945到1947年，波倫與小羅斯福總統和日後接任杜魯門總統的行政機關重要官員相互合作，希望實現他們「一個世界」願景，並期待過去所有協同擊敗納粹的盟國，仍能團結一致打造全新

全球秩序。但最後他仍然屈服於原本秩序——簡言之，肯楠才是對的。波倫在1947年夏天寫給時任國務卿馬歇爾的備忘錄中承認，「相對於所有強權在戰後世界重建重大議題上(包含政治和經濟議題)能同心合作的想法，蘇聯及其附庸國和世界

其他國家的立場南轅北轍。簡言之，現在是兩個、而非一個世界。」

波倫雖然最後認同肯楠的分析，但卻不承認其對後續影響的看法。他在寫給馬歇爾的備忘錄中結論：

面對此一未達共識的事實，不論最後我們可以做到何種程度，美國仍替自己和其他世界上非蘇聯自由國家的福祉與安全著想……必須在政治、經濟和金融上，拉近與世界上非蘇聯國家的距離，同時在平衡利弊後，軍事上亦應團結一致，才能站穩立場，有效處理蘇聯吞併地區問題。

此信念成為日後數十年美國戰略主軸，而其基礎在於接受多個勢力範圍存在之事實。有些地區會落入蘇聯宰制，雖然往往會有駭人後果，但美國最佳行動方案就是強化蘇聯勢力範圍周邊鄰國的能力，同時加強美國勢力範圍內各國的實力與團結。

隨後40年，美國和蘇聯進行了一場世人稱之為「冷戰」的強



權角力。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東歐各附庸國仍然被「邪惡帝國」狠狠踩在腳下。美國歷任總統曾面臨多次危機，他們在過程中必須選擇是否派遣軍隊到由蘇聯主宰的國家，支援那些自由鬥士，尋求行使美國宣揚普世價值應有權利，抑或坐視那些人被屠殺或鎮壓。無一例外，美國歷任總統都是選擇坐觀其變，而非出兵干預：且看艾森豪總統對1956年匈牙利暴動的處理方式，詹森總統對1968年

「布拉格之春」的應處作法（甚或在冷戰結束後，小布希總統面對俄軍入侵喬治亞共和國，以及歐巴馬總統面對俄羅斯特種部隊佔據克里米亞半島的態度）即可窺見一斑。原因何在？這些總統內心都有一個難以接受卻又不容否認的真相：如同雷根總統在與蘇聯領袖戈巴契夫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所解釋，「核子戰絕對沒有贏家，因此絕對不容發生。」

這一小段冷戰歷史應能提醒

世人：同時追求現實與理想的國家，一方面必定會掙扎在基本原則和合理化訴求之間，另一方面則須於權力現象條件中尋得平衡。在外交政策分析家薩卡利亞(Fareed Zakaria)精闢的歸納中，此結果最後會變成「口頭上號稱轉型，但卻只能接受現實。」即便當美國國力到達顛峰時，接納仍代表著接受蘇聯勢力範圍存在的不堪事實。

如同雷根總統在與蘇聯領袖戈巴契夫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所解釋，「核子戰絕對沒有贏家，因此絕對不容發生。」圖為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偕同副總統拜登，會見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Source: White House/ Pete Souza)



板塊位移

經過近半世紀競爭後，冷戰告終，蘇聯也最終瓦解，美國在1991年取得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的絕對主宰地位。在後冷戰時代的前廿年，美國國防預算超越其後十名國家的國防預算總和(其中有五個是與美國締約的盟邦)。就軍事作戰角度來說，誠如前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在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所述，這意味著美國「擁有在所有作戰領域中所向披靡或絕對主宰的優勢。美國大體上無論在何時都能派遣軍隊、在任何地點集中兵力，並以所望方式遂行作戰。」美國及其盟邦歡迎新成員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讓新成員國獲得北約憲章第五條的安全保障，而完全毋須思考風險問題，因為整個聯盟體系在當時根本沒有受到任何真正的威脅。在那個世界中，戰略實質上是與資源有關的壓倒性挑戰所構成。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發生在本世紀初前廿年的權力平衡板塊位移，其劇烈程度幾乎與美國立國244年以來，在歷史上同一時期所發生的任何變遷不相上下。且引述當年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名言：一切發生太急太快，人們根本連震驚都來不及。在1950年，美國幾乎佔全球一半的國民生產毛額比例，乃至1991年的四分之一，甚至萎縮到今日的七分之一(雖然國民生產毛額並不代表一切，但其的確是各國相對權力中的一項構成要素)。而隨著美國的相對國力式微，決策高層所擁有的可行選項清單也跟著縮水。例如美國對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因應作為。中共挾著近3兆美元的貨幣儲備額度，以建立中共核心秩

序為前題下，得以在連結歐亞大陸多個國家的基礎建設上挹注1.3兆美元。而當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宣布美國將增加印太地區投資作為反制手段時，卻只能在新投資項目上提供約1億1,300萬美元。

當然，中共是此一重大轉型的主要受益者。在過去一個世代中，中共的國民生產毛額快速提升：從1991年僅是美國的20%，到今日的120%(此係以購買力平價指數計算。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際貨幣基金據以比較各國經濟規模的計算方式)。雖然中共正面對許多來自內部的挑戰，但吾人有更多理由預期，此種基本經濟發展趨勢持續下去的可能性，要高於其在短期內銷聲匿跡。由於中國大陸的人口數約為美國四倍，就算前者的勞工生產力略等同今日葡萄牙勞工(葡國勞工生產力約為美國勞工的一半)，中共的國民生產毛額也會是美國的兩倍。

在亞洲，經濟權力的天秤更是急遽往中共方向傾斜。身為世界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中共是東亞所有主要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其中也包含美國在該地區的所有盟邦(身為以經濟當作國家手段的侵略性操作者，北京當局毫不遲疑運用其經濟籌碼，在諸如菲律賓和南韓等國反對其要求時，立即予以打壓)。從全球角度來看，中共在科技進步方面也快速成為能與美國分庭抗禮的競爭者。今日，全世界前20大資訊科技公司，有9間隸屬中國大陸。四年前，全球人工智慧的領導者谷歌公司，在評估這項最重要先進科技的競爭力時，中國大陸的企業排名已能與歐洲企業並駕齊驅，現在更可說是遙遙領先：因為陸資企業已



經在包含監控、人臉與聲音識別，以及金融等諸多應用人工智慧領域勝出。

中共的軍事預算與軍事戰力也在快速提升中。廿五年前，中共的國防預算僅有美國的廿五分之一，而今日已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一，且還在迎頭趕上。但有別於美國國防預算用在全球多方面承諾，其中許多都是分配於歐洲和中東，中共的國防預算主要用在東亞。因此，在有關臺灣或南海等衝突的特定軍事想定中，中共可能已經占優勢。在雙方沒有兵戎相見的情況下，檢視雙方軍事能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兵棋推演。2019年，美

國國防部前副部長渥克(Robert Work)與國防部重要國防計畫官員奧赫曼內克(David Ochmanek)對外界公布一項近年來多項機密兵棋推演結果的摘要報告。引述奧赫曼內克所言，兩人透露：「當美國對上俄羅斯與中共時，美國被狠狠痛宰。」另如《紐約時報》摘要所述，「在過去18次五角大廈針對中共武力犯臺的兵棋推演中，美國全盤皆輸。」

俄羅斯則是情況全然不同。不論俄國總統普丁所欲為何，俄羅斯永遠無法重回到他父執輩時的蘇聯。當蘇聯瓦解時，後繼的俄羅斯聯邦只剩下不到

一半的國民生產毛額及人口，疆界更是退到凱薩琳大帝即位之前。然而，俄羅斯仍是核武超強，其所擁有的核彈數量，在功能上與美國的核武殊無二致；俄國的軍事工業仍擁有生產全世界所欲採購之武器項目(印度和土耳其在2019年就證明了這點)；且其仍在不斷擴編欲在戰爭中取勝的軍隊，如俄軍在車臣、喬治亞、烏克蘭和敘利亞一再展現之戰力。在一個多數其他國家以為戰爭已經是過去式的大陸上，維持軍隊多半是為了象徵目的，而非作戰，而強大的軍事實力現在可能會成為俄羅斯的主要相對優勢。



身為世界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中共是東亞所有主要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其中也包含美國在該地區的所有盟邦。(Source: State Department/Ron Przysucha)

回歸基本盤

有人宣稱影響力範圍已經被丟入歷史的垃圾桶，認定其他國家會完全接受在美國主導秩序下所賦予的地位。回顧過去，這種假定似乎要比天真無知還更糟。然而許多美國分析家和決策高層官員，仍抱持著中共與俄羅斯在這段昔日黃花時期所塑造的印象。他們對於美國應該或不應該做哪些事情的觀點，仍然投映在一個已然消失



不論俄國總統普丁所欲為何，俄羅斯永遠無法重回到他父執輩時的蘇聯。(Source: US DOS/ Public Domain)

的世界裡。

許多世紀來地緣政治的角力過程中，決策高層和理論家發展出一整套核心概念，俾利釐清國與國關係的複雜議題，包含勢力範圍、權力平衡和聯盟關係等。這些概念必須與時俱進，將21世紀的特殊條件納入考量。然而，這些仍是瞭解與構築國際秩序最堅韌的基石。

當兩國間的均勢狀態有變，某一方擁有絕對主宰地位後，其所造成的新權力平衡，影響實際上就是創造出所謂「影響力範圍」。這個專有名詞雖在19世紀初才成為外交詞彙，但此概念存在的歷史卻幾乎與國際關係一樣久(如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所言，在波斯帝國於西元前五世紀潰敗後，斯巴達就要求雅典不能重建衛城周邊的城牆以維持在脆弱狀態)。傳統上，強權國都會要求較

弱小國一定程度尊重其疆界及其周邊海域，同時要求其他強權必須尊重如此事實。近年來中共和俄羅斯在其所處周邊地區的行動，就是如此傳統的最新例證。

影響力範圍也能超越地理疆界。當美國領導世界創造網際網路，並促成其運作的軟、硬體問世時，美國當時就享有國家安全局前局長海登(Michael Hayden)日後所稱的「電子監控黃金年代」。由於多數國家還被矇在鼓裡，在被美國國安局前聘雇人員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發之前，完全不知道美國擁有如此強大的監控能力，這種無與倫比的能力，可以利用科技監聽、追蹤，甚至影響其他國家。但在史諾登事件爆發後，許多國家不願接受美國的說法，試圖說服他們拒絕向中國大陸電信大廠華為購買5G無線通信基礎建設。一



當美國領導世界創造網際網路，並促成其運作的軟、硬體問世時，美國當時就享有國家安全局前局長海登(Michael Hayden)日後所稱的「電子監控黃金年代」。(Source: US DHS/Barry Bahler)

如最近考慮5G採購選項的某國領袖所言，華府當局正在設法說服其他國家不要購買中國大陸製造的硬體，因如此一來會讓中共更容易進行間諜活動，所以應該購買美國硬體，但此說套在美國製產品上也成立。

務實省思

從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點來看，中共、俄羅斯與美國間實力彼此消長當然會導致不好後

果。在成為強權後，中共可運用其力量鎮壓香港抗議人士，或讓俄羅斯阻止烏克蘭加入北約組織。南海很可能變成類似加勒比海，而非地中海——亦即中共在東南亞的鄰邦，會像拉丁美洲各國完全臣服在西半球霸權之下。烏克蘭必須忘卻喪失克里米亞半島，因為在俄羅斯「近外」地區的國家已經知道要懼怕並尊敬克里姆林宮。

就世界上許多國家或個人寄

身在美國安全保護傘下，並且追求美國主導之國際秩序，以為如此一來可保護核心自由理想，對他們而言，後果將是一齣悲劇。近年來發生在敘利亞的事件，就可以看出端倪。當阿拉伯之春運動在2010年底至2011年間爆發時，歐巴馬總統最有名的宣告就是，敘利亞領導人阿塞德(Bashar al-Assad)「必須下臺」。但普丁的想法卻不同，而且他願意採取行動實現這些

想法。普丁證明了那個被歐巴馬貶抑為「區域強權」的國家，可以派遣軍隊反抗美國，並幫助敘利亞領導人鞏固控制權。

這是敘利亞人最害怕的事，而數百萬流離失所的難民更會對周邊國家和歐洲帶來嚴重衝擊。但歐巴馬，或是接棒的川普，會因此認定如此結果代價太高，最好還是派遣美軍到敘利亞作戰，甚或讓美軍喪喪當地嗎？面對一個普丁和阿塞德可以恣意呼風喚雨的國家，美國人晚上還能睡得安穩嗎？美國的無所作為已經不證自明。

可悲的是，美國人最終還是勉強接受如此結果——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是如此。如同阿塞德的殘暴統治，俄國併吞克里米亞和中共在南海的軍事化行為，現在都木已成舟，但卻無人會以軍事手段加以挑戰。

當然，承認其他強權擁有勢力範圍，並不代表美國束手無策。回顧近年來美國外交政策過度軍事化，卻遲遲不願採取軍事行動，就被視為默許。華府當局還有其他方式，可以左右其他國家的代價與利益考量：包含譴責無法接受的行為；廢止法律權利；經濟制裁某些國家、企業或個人；支持當地反抗勢力等。但此類工具鮮少可以決定性改變另一個強權已下達之決策，因為該強權已認定其關鍵利益危在旦夕。同時吾人不要忘記，拒絕承認和接受其他強權已經造成的既成事實，多常導致美國的重大政策失敗。從麥克阿瑟將軍在韓戰期間進軍中韓邊界（迫使中共出兵干預和打了一場血腥且沒有結果的戰爭），到小布希總統堅持應該讓喬治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組織（結果造成喬治亞當局過度自信，最後使該國部分

遭到俄羅斯分割），頑固忽視殘酷事實往往造成負面影響。

利滅則散的博物館

關於可採取哪些作為時，華府當局應將聯盟與夥伴關係視為重點。假如中共最終註定得成為如同新加坡長期領導人李光耀所言，「世上有史以來最強大的選手」，那美國就必須致力凝聚聯盟中的其他強權，並且利用結盟關係來迫使中共有所調整。

此邏輯在經濟競技場上最為明顯。在川普政府結束美國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前，該協定整合佔全球國民生產毛額比達四成的國家，建立一個前景，從關稅、國營企業乃至勞工與環保標準等一切事務的共同遊戲規則——提供一個制衡中共經濟實力的手段，原本可使北京成為規則遵循者，而非制定者。所幸有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奔走努力，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現已成真——但美國卻未參與其中。假如美國決策高層可以找出一個容許戰略利益甚於政治算計的方式，就是美國重新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如果此新版協定能夠整合歐巴馬任期結束前，美國與歐盟談判的平行貿易協定，則近全球七成的國民生產毛額就會在制衡天秤的同一端，而中共所處的天秤另一端則僅佔兩成。

相同邏輯也適用在軍事競技場上，只是複雜度更高。華府需要夥伴，但需要的是那些帶來資產多於造成風險者。遺憾的是，美國現有盟邦中鮮少有國家能達此標準。美國聯盟體系中的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接受一次零基分析：從巴基斯坦、菲



律賓、泰國、拉脫維亞、沙烏地阿拉伯乃至土耳其，都必須考量其強化美國安全與福祉的條件，同時評估其所具風險與代價。沒有永遠的朋友。從歷史角度來看，當條件改變，尤其在當主要敵人消失或權力平衡劇烈改變時，不同國家間的互動關係也會隨之變化。今日多數美國人都忘記過去某一時期，亞洲曾有過與北約相同性質的組織，亦即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甚至連在中東地區也有類似組織，亦即「中央條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CENTO)；這兩個組織現在都已成為利滅則散博物館中的歷史文物。如同肯楠所言，「永遠得贏取更多尊敬……但透過決定和勇敢放棄不適當之立場，而非以最頑固態度追求徒具華麗外表或沒有希望的目標。」

欲瞭解延續既有美國聯盟關係所帶來的風險，可以思考兩個今日美國軍事計畫人員憂心的想定。且看中共鎮壓香港抗議活動，假如臺灣果真採取獨立的激烈手段，導致中共暴力以對，美國是否會為了維護其地位而與中共一戰？是否有必要？在歐洲戰線上，假如在處理里加造船廠俄裔工人暴動時，拉脫維亞政府對俄裔族群展開鎮壓，促使俄羅斯併吞拉脫維亞部分領土——有如克里米亞事件2.0——北約組織是否應立即援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第五條保證，採取軍事反制行動？是否有必要？假如上述兩問題的答案都非斷然肯定——的確難以判定——那現在就該比照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採行的壓力測試法，開始對聯盟進行壓力測試。

考量在這個新世界中的核武現實條件，如此

作法就顯得更為重要。中共和俄羅斯均擁有可恃的第二擊核武戰力——換言之，兩者都有能力承受核武第一擊，並發動能摧毀美國的報復性反擊。因此，不僅核子戰絕非可行選項；即便可能升級成核子戰的傳統戰，都有造成災難的風險。因此，競爭行為必須時刻保持警覺、克制並審慎考量承擔風險。對於某特定與某些可能擁有或想像擁有華府開出空白支票的國家，形成兩造間新仇舊恨糾纏不清，這最終會引發重大問題。給予盟邦保障，或造成其領導高層肆無忌憚採取行動，兩者界線實則相當模糊。

假如針對臺灣或波羅的海地區的傳統戰爭軍力平衡，轉為對中共和俄羅斯絕對有利的情況，美國現下可能就無法繼續維持承諾。這些承諾和美國實際軍事能力間存在之落差，就是典型的「過度擴張」(overstretch)。對於既有聯盟體系，以及美國與50多個條約盟邦和夥伴間的關係，零基評估的意義，應該就是來自分析證據的結果。但該項分析結果很可能會導致美國放棄某些盟邦，轉而加強挹注其他盟邦，彼此擁有有利雙方國家安全的重要資產，同時大幅修正每項承諾條件，俾使義務和限制條件具有提供保障並保證同等重要地位。

此程序也可強化美國選擇更新承諾的可靠度。雖然經歷冷戰的資深人士可能有理由主張，北約組織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聯盟關係，但無論川普或前任歐巴馬總統卻都對此點存疑。很明顯美軍指揮官在北大西洋會議中，會授權對俄國併吞克里米亞半島採取軍事回應，而美國政府在事件結束前也無法下決定。重新思考美國對盟邦的承



中共和俄羅斯均擁有可恃的第二擊核武戰力——換言之，兩者都有能力承受核武第一擊，並發動能摧毀美國的報復性反擊。(Source: US Government)

諾，有助強化美國的安全並讓這些條約更為堅實。

正在創造(或重塑)的現況

戰略是一種特意將手段和目的匹配在一起的作為。在許多戰略失敗的案例中，兩種最常出現的情況就是無法匹配——某個行為者可以組織與維繫的手段，不足以達成其宣示目的——以及願景盲目，亦即行為者執迷某項空具理想但卻無法達到之目的。美國在中東地區

發動的兩場21世紀戰爭，就是絕佳例證。

放眼未來，美國決策高層夢想中的世界，應放棄那些難以企及的理想，並接受影響力範圍仍將會是未來地緣政治的核心特徵。接受此種現實條件無可避免將會是一個漫長、混亂且煎熬的過程，但卻也能帶來新一波戰略創意——一個至少可以澈底重新思考美國國家安全所擁有之概念性軍力。

今日多數外交決策高層對於

美國在世界應扮演角色的基本觀點，都是來自美國贏得冷戰勝利後的那廿五年。這個世界已經是昨日黃花。其衍生的後續影響與美國人在1940年代末期所遭遇到的情況同樣深遠。因此吾人應該記住，今日被世人視為「智者」的那些人，是花了多久時間才瞭解其所面對的世界。從肯楠那封「長電報」最早警示冷戰競爭的發生，以及完成「國家安全會議第68號」(NSC-68)戰略評估報告，過往美國耗時五年才完備全般戰略。今日美國外交政策圈所面對的混亂情況，並不足以敲響警鐘。假如冷戰大戰略都須耗時五年才能完成其基本作法，以為我們這個世代會做得比前人好，也未免太過妄自尊大。

作者簡介

Graham Allison 係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著有《終須一戰：美國與中共能否跳脫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Copyright © 2020,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ublisher of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Tribune Content Agency, LLC.